

# 史海拾珠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茅盾电话直拨中央统战部

茅盾于1965年辞去担任了长达15年的文化部长之职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不久，他被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和“30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”受到批判。到了1969年国庆，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参加重大活动的一长串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消失，他也只好用沉默表示抗议。而此同时，儿子韦韬的所谓“五一六”问题已澄清，被派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“支左”；最让茅公和重病在身的夫人放心不下的却是儿媳媳陈小曼，她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属于“砸烂单位”，按规定要“一锅端”下放文化部向阳湖“五七”干校，9月底已去了第一批，12月底去最后一批。而陈小曼的小女儿生下四个小月，嗷嗷待哺，地下工宣队打报告请求再晚些时下去，也被回

绝，无奈之下，只好给孩子断奶。婆婆知道这一决定后，叫她再求求工宣队，就说等老婆婆咽了气，再去咸宁行不行？得到的答复竟是：“你又不是医生，陪着病人有什么用？”结果陈小曼离京不到一个月，婆婆便在深深的遗憾中离开了人世。

夫人病逝，茅盾十分悲伤，一度失声痛哭。第二天，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问如何办后事，他答道：“从简办理，但要等她回来再办。”家里立马给陈小曼打了电报，1月30日，收到陈小曼的回电却是：“请假未准！”得到如此不通人情的电报，性情一向温和、从不利用职权找人的茅盾忍无可忍，终于发火了。他操起电话，直拨中央统战部，表示极大不满！由于心情很不好，第二天去八宝山为夫人火化时，

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只有叶圣陶等几个亲友参加。而他的意见总算引起有关部门重视，先是统战部打电话同文化部交涉，然后咸宁干校：又接到指令，2月3日，正在地里干活的陈小曼才被特许立刻返京奔丧。她一人从向阳湖赶了十多里路，晚上到了咸宁站，来不及买票就跳上了火车。由于匆忙中随身携带的通行证上没有盖公章，她在火车上还被警惕性颇高的列车长盘问，招致围观，继而挨批。有的乘客手拿“红宝书”，高声宣读毛主席语录：“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。”

到了武汉车站转车时，她又被民警怀疑，说她竟敢冒充是沈雁冰的儿媳。又费了一番周折，她才如期到家。

听了陈小曼的述说，茅盾安慰道：“从另一方面想，

这种经历也让你领略了当前社会的众生相。”办完夫人的后事，茅盾心力交瘁导致急性肺炎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

陈小曼的十天假期很快满了，她找本单位的工宣队长请求续假照顾老人，也未能如愿。茅盾便对她说：“不要再求这种人了！我的病危期已过，你还是放心回咸宁去吧！”

陈小曼回干校又呆了一年，白天在大田劳动，夜里几个人住一间房，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炼。

1972年冬，同样“毕业”于咸宁干校的著名老诗人臧克家，第一个前去探望茅盾。这次久别重逢，使茅公激动不已，提笔写下一首五绝：“惊喜故人来，风霜添劳疾。何以报赤心？亦惟无战栗。”而臧老写的“校友”陈小曼此时也已提前返城重操旧业，后来翻译了几本外国小说，并和韦韬合著了《父亲茅盾的晚年》。

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1933年：我与警察的一场冲突

上海档案馆收藏着1933年我在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档案。事情的经过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一天，我从龙华骑自行车回大同大学，骑到学校附近的车站路时，不小心车身碰到了一个人的衣服。我急忙下车，向他道歉。没想到自己这种讲礼貌的做法，反而惹出了麻烦。那个人脸胖胖的，穿了一件绸大褂，外表并不像是流氓，却对我耍起流氓来。他不放我走，一定要我跟他一块去“吃讲茶”。我是上海人，懂得“吃讲茶”的意思就是到茶馆去同那个人谈判赔偿问题。我在念书，工作也很忙，哪里有时间同他纠缠？我说：“有什么好再谈的呢？如果我碰伤了你的衣服，我就赔偿你的医药费用。如果我弄坏了你的衣服，我就赔偿你衣服的损失。可是你既没有受伤，衣服也没有损坏，并且一点也没有被我弄脏，我已经向你道歉了，没有

必要再去吃什么茶。”这时来了一个警察，他同那个流氓一定熟识，走到我跟前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，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！”我从未受过如此侮辱，也从来没有被人打过耳光。我一怒之下也回了他一个耳光。那个警察就举起警棍来打我，没有想到我一伸手就把警棍夺了过来。这下他急了，一吹警哨，又来了两三个警察。于是我就挥舞着警棍和三四个警察打。我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地上。这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刘先生正巧路过，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，向我父母报信。我父母一听，心急慌忙就往车站路跑。我同警察正在对打的时候，大同大学的同班同学葛曾济(后改名葛一虹，那时他在学校学的也是理科，现在是有名的戏剧专家)看到了，马上跑到学校里(打架的地方离学校非

常近)告诉了同学们，说我们的同学郁鍾正(我本来的名字，于光远是后来再起的)正在挨警察的殴打。我在学校里是被人称为有点“学问”的学生，同学们都知道我，因此一听说我挨打了，立刻有上百个同学飞奔赶到打架现场，把设在车站路上的派出所给围住了(这时候我已被几个警察弄进了派出所)。当时，围观的人不知有多少。车站路是通有轨电车的，这么多的人挤在路上，几十辆电车被堵住开不动了。警察局一看形势不妙，怕惹出大乱子，就想赶快了结这件事情。同学们趁机向警察局提出了四个条件：第一要向我赔礼道歉；第二要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；第三要马上送我进医院治疗，由警察局负担全部费用；第四……警察局被迫都接受了。

于是，我进了附近一所医院。这时我的父母也赶到了，陪我进医院后，脱

## 谁为李大钊办丧事

李大钊牺牲后，身后萧条，当时《晨报》报道说：李死后，“李妻闻耗，悲痛号泣，气绝复苏者数次，病乃愈益加剧，以致卧床不起。小儿女绕榻环立，其孤苦伶仃之惨状，见者莫不泪下。李之乐享原籍，家业毫无。生前唯知努力学问，不事生产，平素又极俭朴，故境状萧条”云云，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，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、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、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，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，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，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静思寺内停放。梁漱溟晚年回忆说(见汪东林《梁漱溟问答录》)：李大钊牺牲后，他立即由西郊赶往城内，“一面看望其家属，一面看守守丧装殓”，他还通知吴弱男夫人参与死者的人殓(李大钊生前曾是章宅的家庭教师，“寔甚相得”)。

记着“文革”结束不久我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看到一张清单，那是李大钊牺牲6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，读之不禁大吃一惊：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，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，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，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、蒋梦麟、沈尹默、周作人等，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，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。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：国葬、公葬和民葬，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“国葬”，民葬，李家又无力承担，只得公葬(又分为厚葬和大钊两种)。北大同事惠李大钊之事迹，相与发起厚葬，这发起人的13人中，有蒋梦麟、胡适、沈尹默、周作人、傅斯年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马裕藻、马衡、沈兼士、何基鸿、王烈、

樊际昌等，每人捐20元，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、马叙伦等各捐20元、李四光等各捐10元，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，上海如鲁迅，捐了50元，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，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，陈公博300元，戴季陶100元，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“同志”，或曾是“盟友”，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。

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，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(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)，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。1933年4月22日公葬举行时，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部长李书华、农矿部长易培基、国民党中央监委黄少谷(都曾与李钊于“三一八”后遭北洋军阀通缉)等，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、周作人、马裕藻等。

摘自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钢琴是他存在的证明

1

作为一个资深钢琴爱好者，我可以傲慢地不屑西蒙。虽然他录过舒曼、肖邦、贝多芬等人的全集，并入选《20世纪伟大钢琴家系列》，可是一辈子弹浪漫派的人那那么多，几秒钟内我的脑子里就能堆满那些伟大的名字：柯托、怀尔德、齐佛拉、克莱本、博列利等等，个个都是傲视群雄的天才，天才太多的世界，让我们可以奢侈得拒绝天才。西蒙的录音，我小时候听过大量，还在音乐学院磁带录音室见过大量，但仅此而已，我没见中国美国的发烧友把他挂在嘴边。可是，自从我知道他70岁时双手因车祸重伤，经过治疗重登舞台，这个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再也不能消失。

西蒙今天弹舒曼实在不能让人满意，因为过去他弹得实在是太好了。眼见他不能到底，装饰音不能圆润，让人又急又怜。可是中场休息后弹肖邦，却越来越好，似乎进入了状态。第一首夜曲仍有某些掉转不灵，后面的第三奏鸣曲却慢慢弹好了。弹舒曼的时候他似乎只能靠手臂自然重量发音，而在肖邦中所有的和声突然镀上颜色似的，闪闪发光，尤其是第四乐章，跟前面对若两人。我听得吃惊，心想老头必然在掌声中来人报，必然加演。

管风琴

在欢呼中，85岁的老头微喘着然而也许是自豪地慢慢下了台。他真的好矮。他一定累坏了。其实我也累坏了。我们都歇歇吧。回家后明天我想听的东西，一定是巴赫。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忍受这么张狂的音乐的啊？从年轻high到年老。

只能这样说，这些弹浪漫派到80岁的钢琴家，好比是……特殊材料制成的人。

独奏会转天，他开大课。他现在的样子，我真希望他能私拍下来，可是总没机会。在网上你绝对找不到这么生动真实的照片。他现在脸色苍白，双眼空洞，皱纹如刀刻，面部没有表情，但是，绝对是衰弱自怜的气质。他从来都是一个的人，没有人搀扶和陪伴，走路很慢但自然从容。说话呢，就是典型的钢琴老师的样子，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。看上去，对他来说钢琴就是生活的全部，别的事情没什么要管。

他说现在人弹琴太猛，简直人现站起来，其实不必要。改变分句和力量分配完全可以达到更好效果，有时造成“快”的双眼空洞，皱纹如刀刻，面部没有表情，但是，绝对是衰弱自怜的气质。他从来都是一个的人，没有人搀扶和陪伴，走路很慢但自然从容。说话呢，就是典型的钢琴老师的样子，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。看上去，对他来说钢琴就是生活的全部，别的事情没什么要管。

## 吸血蝙蝠给人的启示

杨扬

在非洲草原上，有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叫吸血蝙蝠。它的身体极小，却是野马的天敌。

这种蝙蝠靠吸动物的血生存，它在攻击野马时，常停在野马的腿上，用锋利的牙齿极敏捷地刺破野马的腿，然后用尖尖的嘴吸血。无论野马怎样蹦跳、狂

奔，都无法驱逐这种蝙蝠。蝙蝠却可以从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，落在野马头上，直到吃饱为止，才满意地飞去。而野马常常在暴怒、狂奔、流血中无可奈何地死去。

动物学家在分析这一问题时，一致认为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，

却郎朗小朋友弹琴，西蒙怎样看——如果经受住他的挑剔还能保持那样的速度，自然了不起，如果郎朗以牺牲细处换来速度，那么这种过健的风头只能表明“世风日下”。

西蒙强调，新强要成为一种“膨胀”的效果，千万不要在某个音上突然强起来。他示范，果然听上去质地很细很粘，这就是渐渐做得好。我看所有人讲大师课都提到这个问题。怎么才能做得好，本来难以言传，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经验，一下子就可判断，什么是最佳解。如今牛人多如牛毛，但音乐上细致完美的真人，绝非俯拾皆是。

据说西蒙是浪漫派的直接传人，我想也许不错。他特别注意层次和变化，对轻柔抒情性的东西从不放过。有评论说他的舒曼是“调情样”的，对吧。他弹舒曼很轻飘，对力量很吝啬，绝不滥用。老头在台上缓行的样子，难免让人浮想联翩。如果说在我们学校一年年地弹，属于顺理成章的话，那么不到一个月前他在卡内基开独奏会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老成这样，到哪里都是最老的教授，最老的音乐家，最老的人。他的朋友亲人肯定一个个地离开了。也许他拯救自己于忘却，忘却岁月带来的死亡，只要有钢琴就满意了。我猜他一定舍弃了大量的复杂，把自己简化了活下来。

摘自《文汇报》

远不会让野马死去，野马的死亡是它暴怒的习性和狂奔所致。

细想一下，这与现实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将人们击垮的有时并不是那些看似顶天立地的挑战，而且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人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无休止地消耗在这些鸡毛蒜皮之中，最终让大部分人一生一事无成。

摘自《大众阅读报》

## 测高的方法

佚名

一个问题往往不只有一个人答案，真正有创意的人是喜欢自己思考，从现有的标准答案外找到其他答案的人。

许多人在中学时代，被问过这样一个物理问题：“如何利用气压计测算一栋大楼的高度？”而几乎每个用功学生的回答都是：“用气压计测量地面与楼顶的大气压力，然后用这个大气压力差即可计算出大多数的高度。”答案非常漂亮，也是参考书里的现成标准答案。

物理学界流传这样一则故事：某年，有一个学生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居然是：“带着气压计到高楼顶，气压计上绑着一条长绳，然后缓缓垂下，等气压计触及地面时，再拉上来，绳子的长度即是大楼的高

度。”老师给了他零分，但该名学学生却辩说答案完全正确，应该给满分。最后师生同意请一位大师来做仲裁者。大师提醒该学生这是物理考试，答案一定要包含某些物理知识，然后给他六分钟作答。过了五分钟，答卷上还是一片空白，大师问他是否要放弃，那位学生却说：“答案有很多个，我只是在想哪一个答案最好。”然后奋笔疾书，在最后一分钟总算交了卷。他这次的方案是：“带着气压计到高楼顶，弯身松手让气压计落下，同时用码表测量气压计掉到地面所花的时间，大楼高度等于二分之一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时间的平方。”答案完全正确，而且也用到了物理公式，老师只好给他接近满分的高分。

几年前，我与表叔开了一家鱼店，生意挺火。大师傅炒得一手好鳊鱼，店里每日鳊鱼片的需求量很大，从采购到洗、切、煮一条龙，3名师傅忙不过来。我在店门前贴了一个小广告，想招聘两名新员工。也许是给的福利待遇不错，前来应聘的人还真不少。

一天傍晚，我与表叔正准备打烊，进来一个小姑娘，年纪约十五六岁。进门打量了半天，不说一句话。一见她那样子，我心里就猜出了个八九分：“是来应聘的吧，我这里需要的不是你这样的人手，对不一起啊。”

小姑娘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，但似乎有些不甘心：“如果我在这里做小工，不要你们的工资呢？收不收下我？”

我仔细打量她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就是个头矮小、体质偏瘦，显然不是做

度。”老师给了他零分，但该名学学生却辩说答案完全正确，应该给满分。最后师生同意请一位大师来做仲裁者。大师提醒该学生这是物理考试，答案一定要包含某些物理知识，然后给他六分钟作答。过了五分钟，答卷上还是一片空白，大师问他是否要放弃，那位学生却说：“答案有很多个，我只是在想哪一个答案最好。”然后奋笔疾书，在最后一分钟总算交了卷。他这次的方案是：“带着气压计到高楼顶，弯身松手让气压计落下，同时用码表测量气压计掉到地面所花的时间，大楼高度等于二分之一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时间的平方。”答案完全正确，而且也用到了物理公式，老师只好给他接近满分的高分。

## 破鳊鱼片的姑娘

蒋平

能到我妈那儿买鳊鱼就可以了……因为我妈……她是残疾人……”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！第二天一大早，在小姑娘的指引下，我找到了她的母亲。这是一位破鳊鱼片的大婶，“我妈以前的生意是这儿最好的，去年出了车祸，左手失去了3根指头，破鳊鱼片的速度变慢了，现在卖出去的鱼还不到以前的一半。”小姑娘解释说，“除了卖鳊鱼，妈妈没有别的赚钱路子。卖不出鳊鱼，一家人就没有经济来源，我就得辍学……”

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今后店里的所有的鳊鱼一律从这里进货。这样一来，店里还将增加破鳊鱼的成本。虽然小姑娘每天主动来帮着破鳊

上也都贴着诺诺兹所说的一句话：“人总是千方百计，避免真正用心去思考。”爱迪生用它来提醒自己和他的员工。

“避免真正用心去思考”的确是多数人的通病，遇到问题时，总是先去找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可用，有什么漂亮的公式可套，但套公式并不等于在思考。这些现成的答案，漂亮的公式，其实只是我们用来装点门面的框框，它们阻碍了我们真正用心去思考。

上面关于波尔的故事，其实更像一则“科学寓言”，旨在告诉我们，一个问题往往不只有一种答案，真正有创意的人是喜欢自己思考，从现有的标准答案外找到其他答案的人。

每一个想要发挥创意的人，也应该以此来提醒自己。

摘自《组织人事报》

鱼，但速度还是跟不上。高峰的时候，还得请“外援”。这时候小姑娘就很着急，有两回还划伤了手指，但每次没等伤好，她就在店里忙来忙去。

日子一晃过了两年，小姑娘也为我破了两年鳊鱼。破鱼的速度由慢到快，到后来，基本上不用请“外援”了。两年后，小姑娘成了大学生，开学那天，我和表叔商定，将她两年来应得的工钱封了一个大礼包给她。小姑娘先是一愣，说是什么也不肯收。后来，收是收了，但前提是作为预支的工资，每年的寒暑假，她还会来店里帮着破鳊鱼。

有一件事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：其实小姑娘破鳊鱼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只不过在她划伤手指的那些日子里，鱼店里的几名员工，都学会了破鳊鱼，大家知道她的家境不好，都想帮她。

摘自《南方周末》

## 美文闲读